

齊氏文化基金會

“推動中國進步獎” 頒獎一覽

第一屆（2008,11,2.）

議程：

齊氏文化基金會首屆“推動中國進步獎”頒獎 暨“和解與和諧”討論會

一，時間：2008 年 11 月 2 日（星期日）下午 2：00—5：00（請提前半小時入場）

地點：十三樓 474 Flinders Street Melbourne 3000

受獎人：中國和解智庫

王光澤(大陸召集人 大陸 86 1360 1087 428)

丘岳首(海外召集人 悉尼 0414 935 438)

二，議程：

- 1，主持人簡昭惠、阿木(基金會理事兼執行秘書)宣布會議開始；
- 2，宣讀賀電、賀函：林通、林資蕙、老戴維、阿森、武博晗、夏兒
- 3，基金會理事老戴維宣讀頒獎詞；
- 4，基金會理事、澳大利亞前國會議員陳之彬向“中國和解智庫”代表頒發獎狀；
- 5，基金會理事齊家貞向“中國和解智庫”代表頒發獎金並作“基金會緣起及為何頒給和解智庫”的發言；
- 6，嘉賓發言：馮崇義、蔣天麟、胡平（未能出席，由高寧讀信稿）、陳之彬、周素子、張鶴慈、王軍濤、張小剛、丘岳首
- 7，“中國和解智庫”代表致答辭並作“和解與和諧”專題演講；
- 8，討論問答主持人：馮崇義，王光澤，丘岳首

三，工作人員及聯繫方式：

齊家貞（基金會理事、聯絡 0433 290 433），

老戴維（基金會理事、接待 0412 797 781），

阿 森（獨立中文筆會、攝影宣傳 0413 263 827）

阿 木（基金會理事兼執行秘書、統籌 0422 562 550）

四，注意事項：

- 1，外地代表可在 11 月 1 日（星期六）或 11 月 2 日（星期日）上午到達。需接機者請事先聯繫老戴維：0412 797 781。
- 2，外地代表會議結束後去唐人街晚餐，晚 9 点左右乘車去 Ballarat 農場，第二天旅遊觀光。

頒獎詞：

齊氏文化基金會將首屆“推動中國進步獎”頒給“中國和解智庫”，旨在喚起公眾對理性思考、平和對話及孜孜探求和解之道的關注。中國和解智庫始終堅持民族和解、宗教和解、文化和解是推動中國進步的最好選擇，這與齊氏文化基金會的創立宗旨不謀而合。

基金會緣起及為何頒獎給中國和解智庫 （墨爾本）齊家貞



二零零八年三月，我用我父亲齐尊周遗留的资金，在他去世十周年之际，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注册成立了齐氏文化基金会。经过数个月的运作，今天，齐氏文化基金会在这里举行颁奖仪式，将首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给中国和解智库。

父亲齐尊周，一位至死不渝的爱国者。在一生遭受近二十三年的牢狱之灾，个人和家庭蒙受巨大损失后，他仍坚持说：“我爱国没有错。如果时间可以倒转，我还是会象一九四九年那样，拒绝出国，坚留大陆。”

父亲至死都没有实现他怀抱了七十年的愿望——把埋葬在柬埔寨金边他父母的遗骨运回中国海南岛老家安葬。父亲在美国定居十四年后，因癌症亡故，女儿齐家贞把他的骨灰从美国洛杉矶运回重庆，与早逝二十六年的他妻子张则权合葬。

一九八四年九月父亲离开中国前，他到母亲的坟前告别，他去上海、广州向亲友们告别。一生中，他从来没有象这次哭得那么久，哭得那么伤心，从来没有流过那么多的眼泪。

为什么？

他实在舍不得离开他发誓要以生命报效的这块土地。

十年前，父亲笑了。他回到了这块土地的怀抱，在他逝世之后。

现在，父亲又应该笑了。

以他留下的血汗钱设立的齐氏文化基金会，有这么多的志愿者出谋献力，有这么多人理解与支持，“中国很大，我们很小，但，我们心齐，愿意为中国的进步做一点事情”。基金会崇尚脚踏实地“为中国的进步做一点事情”，这也是父亲穷其一生想做没有做完，或者没有做到的事情，现在后继有人，他在天之灵得以安慰安息。

齐氏文化基金会为什么将首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给中国和解智库呢？

首先，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的和解智库，而不是关于任何另外一个国家的和解智库。我们走南闯北漂洋过海，回首眺望的常常还是那片土地；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心里牵挂的也往往还是那片土地；无论我们是否在那里埋葬过青春，也无论我们今天已经两鬓斑白或老态龙钟，无论时光怎样流逝，也无论我们离开那里多么长久，我们总是思念着她，怎么都放不下。哪怕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动，仍然有一件事始终如一，就是我们对那片养育我们与我们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土地的爱恋。

第二，近二十年来，中国已经有所变化，中国已经有所进步，事实有目共睹。这些变化与进步使中国存在和解的可能性。中国和解智库在此基础上，“以真相促进和解，以和解推动转型”，“情系政治和解，意在民主转型”。我们颁奖给中国和解智库是肯定他们在这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期待着，中国的天空变得清澈，父母官变成公仆，老百姓手上有选票，不仅要饭桌上有佳肴，更要头脑里有思想，脸上发出由衷的笑容，心里充满了阳光。只有和解，才能以最小的成本，实现这个目标。

齐氏文化基金会颁奖给中国和解智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突显与张扬和解与智慧的重要性。就是要提请人们注意，要结束中国几千年更换朝代那种没完没了的征战杀戮，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要结束那种一代又一代的旧恨新仇，冤冤相报的血腥历史，就应该选择理性、和平、清醒的政治和解与民主转型之路。

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了树敌习惯了仇恨习惯了对抗，但我们不习惯友爱对话宽大为怀；我们只讲绝不妥协绝不拿原则作交易，不讲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进退有据；我们只讲寸步不退寸土不让，不讲

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们只讲以牙还牙血债要用血来偿，不讲以德报怨以柔克刚化干戈为玉帛；我们不习惯说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请宽恕.....

我们需要和解，我们更需要和解的智慧。

齐氏文化基金会才刚刚起步，我们将象孩子一样长大成熟，沿着我们既定的目标，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下去。

最后，让我们一起记住法国伟大作家维克多·雨果说的话：我们向未来索取的不是仇恨，而是正义！

谢谢各位来宾光临，谢谢大家的呵护、参与和支持。

2008,11,2.



答謝詞：

革命伦理昌兴与政治和解的困境 （北京）王光泽



非常感谢齐氏文化基金会把这个奖项颁给中国和解智库。前几天听说诺贝尔和平奖可能会颁发给国内维权人士，我为之激动了好半天。虽然中国人再次与诺贝尔和平奖失之交臂，但是诺贝尔和平奖的精神仍被我们传承，齐氏文化基金会的这个奖项隐含的价值与诺奖完全一致，所以获得这个奖项，我感觉犹如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样。

齐家贞大姐先父是国民党的技术官员，在毛泽东时代遭受过残酷的政治迫害，齐家贞大姐在中共的大牢中受刑 10 年，专制制度摧毁了她的青春。上次在香港见到齐家贞青春靓丽的女儿，我就想齐大姐年轻时也肯定是这般美丽清纯，但是这段美丽却被阴霾和血泪所笼罩，该是何等残忍的事情。

齐氏是中国大陆万万千千遭受过政治迫害的家庭中的一个，但无论是家贞先父还是家贞本人，却不计前嫌，为政治和解鼓与呼，为终结绵绵不绝的争斗和仇恨鼓与呼，在此，本人感佩不已。

再次感谢齐氏文化基金会颁奖给中国和解智库，同时祝愿齐家先父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和解、博爱的血脉能够在中华民族发扬光大！

演讲正文

我们中华民族的上古先贤曾经渴望，将神州大地塑造成充满王道精神的自由乐土，没有仇恨没有征战，然而从秦皇汉武、陈胜吴广开始，这种精神就在中华大地上根绝。看看今天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已经将“光荣的革命传统”颂扬了 60 年。革命这个词如此昌盛，在毛泽东时代，结婚也要结个

“革命婚”；在当今时代，连黄菊这样上海滩起家的权贵人物去世也被盖棺定论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

革命是什么，革命的字面意思就是革除他人性命，就是“杀人”。我们中华民族不是礼仪之邦吗？我们不是文明古国吗？为什么沦落到把“杀人”这个词奉为圭臬？我们这个民族不是主张“中庸之道”吗？不是主张“和为贵”吗？为何把仇恨与争斗奉为不二法门？

让我们回到一些历史的常识里，或许更能明白一些政治上的常识。

从杨开慧之死说起

毛泽东身前公开的有 4 个妻子，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之命，没有正式成亲，第二个妻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也是毛泽东自由恋爱而结合的杨开慧。杨开慧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教授。

从后来的历史材料来看，杨开慧的确是位美丽大方、贤淑温婉的江南女子，这一点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也不否认。毛泽东试图用暴力颠覆国民政府，湖南地方军政要员对其恨之入骨。为了阻止毛泽东继续闹革命，逮捕了杨开慧，并勒令她与毛泽东断绝关系。杨开慧不从，被湖南省军政首长何健下令将其处决。她被枪决之后连身上的旗袍都被刽子手扒掉，这位美丽贤淑的江南女子就这样没有任何尊严地香消玉殒。

不难知道，杨开慧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这完全是政治报复。

张戎在书中认为毛泽东对杨的死无动于衷，把毛描述为一个生下来就老谋深算、心狠手辣的“坏蛋”。这一点很难让人认同，杨开慧毕竟为毛泽东生了 3 个孩子，含辛茹苦抚养他们长大。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国的“新皇帝”之后，甚至不顾及第一夫人江青的感受 1958 年公开发表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他在这首诗中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其中的“骄”就是“娇”的同义字，即“娇美娇艳”的意思，意指杨开慧美丽可爱，可见毛泽东对杨开慧还是很有感情的。

无独有偶，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第一个妻子是父母之命，第二个妻子也是自由恋爱，也是因为丈夫是持不同政见人士，而被国民党地方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朱德的第三任妻子伍若兰是游击队的直接参战人员，她被蒋介石下令处死，并被砍下她的头颅悬挂在长沙街头示众。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了国民政府时代反对党中的头号人物，在成功颠覆国民政府之后，这三个人也是新政权中的三巨头，这三个人也出现在大陆的人民币当中，我们不得不天天和他们打交道。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手段之残忍通过杨开慧之死可见一斑。在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发动清党，此间国民党甚至提出过“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被枪决的共产党人不计其数，甚至殃及到一些被怀疑为赤化分子的人。

不难理解，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通过各种名目的运动对国民党进行同样残酷的政治报复，死亡的人数、殃及的家庭已经无法统计，普遍相信在数百万之巨。仅镇反运动之后，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处死的人数为 71 万人，监禁者 129 万人，管制者 120 万人。

杀人的刀一旦举了起来，就有杀下去的惯性，很难落得下来。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仍在贯彻“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革命逻辑，国民党杀完了，开始了反右、大跃进、文革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进行旷日持久的自相残杀。死于共产党政权之下的有多少人，恐怕谁也给不出一个确切的数字。海外的研究更是让人毛骨悚然，旅美华人政治评论家曹长青在《中共建党 80 年杀人记录》中宣称中共杀人总计可达 8000 万，已经超过中共发展了 80 年的党员总数。

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就是一头怪兽，即使中共中央高层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但是专制的惯性已经深入公权力的骨髓，脑袋已经指挥不了身体，蛮横的违法行为随处可见。如果官方对民众的怨怼处理不当，必然会酿造出大小不等的群体性事件。

当重庆万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等特别是县市级群体性事件爆发时，借助网络、手机短信等现代科技，民间的不满被迅速放大，悲情被迅速传递，并跃出网络，演化成一场又一场实际的暴力，地方政府遭到攻击，甚至地方治安当局也被攻陷，不得不大量调入外地警力来维持社会治安。

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05 年社会蓝皮书报告》透露，从 1993 年到 2003 年间，大陆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经由 1 万起增长为 6 万起，参与人数由约 73 万增加到约 307 万。靠革命起家的中共在民间埋下的革命火种正在延烧，并在不断地寻找火山的喷发口。

群体性事件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如果套用中共惯用的革命话语，实际上就是民间的起义。群体性的民变四起，似乎“革命”之火已经成燎原之势。

革命伦理经久不衰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毛泽东在接见古巴代表团的时候，代表团的成员请他谈谈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说自己本来是一介书生，后来被“逼上梁山”。他最初也想走非暴力路线、议会路线，但是幻想相继破灭，最后落草为寇，上山打游击。

当北京的杨佳扬刀出鞘、砍杀上海 10 名警察时，他沿袭的也是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逻辑。他说，当上海警方侵犯他的权益而不作出相应的补偿时，“他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他一个说法”，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伦理具有同构性。杨佳的暴力行动被有些网友高调颂扬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已经被网民塑造成新偶像“北京刀客”，可见暴力崇拜在网络中何其蔓延。我们都是喝“狼奶”长大的，革命教育之下的人很容易用革命的思维来度量和处理问题，中共的革命逻辑在下一代身上延续着不灭的香火。

把杨佳说成是革命者，如果说这是网友的搞笑，那么法轮功和中共之间的确是一场货真价实的政治对抗。

例如，众所周知但又讳莫如深的法轮功问题，法轮功本来是民间自我修炼的团体，而且在各地合法注册公开活动，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诉求。起因是法轮功发起了人数众多的上访活动。例如 1999 年的 4 月 25 日的法轮功信徒突然大量出现在中南海附近，后来被官方媒体描绘为“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信徒在中南海周围的聚集，安静有序，没有任何暴力活动，哪里称得上“围攻”？他们不过是在践行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公民有集会自由”这一政治性权利，信访也是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公民可以采取表达民意的手段，法轮功的上访活动除了无法履程序上的批准之外，并不违背大陆现行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4·25”事件之后，法轮功被全面取缔，不得公开传授功法也不得公开练习，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各种法制教育班，甚至被劳教判刑。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遵照党的旨意颁布了“反邪教”单行性刑法条款，中共名下的媒体展开一波又一波对法轮功的言论围剿，其中看不到对法轮功的半点肯定。让人难以相信，这个风靡大江南北、甚至不少中共官员也参与的健身运动怎么一夜之间成了“邪教”？

人有时是理性的，但是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形，中国有句俗话“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就是这个意思。由于长期得不到合法化，法轮功会不会哪一天就忍不住了呢？

法轮功的抗争模式一直贯彻了非暴力原则，践行了“忍字”为上的精神。但是这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一旦和民间暴力结合，会不会演化成一场革命伦理和革命行动的再次完美结合？

中共专制统治了 60 年，要想不激进是很难的。鉴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传统，谁也不敢担保革命不再发生。中共的扩展与壮大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真实写照，在 1949 年之前，大部分国人对中共还维持着“共产共妻”的不良印象，南京的高官显贵、大上海的白领富商谁能想到中共这群躲在延安窑洞里的“土八路”能够攻城略地，夺取国家政权？

中国民间社会的每一个群体性事件处理稍有不慎均会使得民众激发政治性诉求，因为每一个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都隐含着制度的漏洞。法轮功事件就是由普通的上访事件演变成一起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中共高层多次强调对于处理群体性事件要小心谨慎，要有政治高度，其中的隐忧也在这里：担心群体性事件政治化，或上升为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当群体性事件之间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也缺乏意识形态的支持时，顶多只是一场又一场的无意识的骚乱。但是这些群体性事件上升为政治诉求，甚至寻求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撑，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实质意义的革命活动。

政治和解的尴尬与困境

在一个有着暴力革命传统的国家，在一个专制统治了 60 年还不知道改旗易帜的国家，谈和解显得极为可笑，因为此刻要求人们理性、温和是很难的。如果有人跑到杨佳和闸北警方面前大喊：“你们和解吧！”其结果很可能是警察先揍你一顿，杨佳再给你一刀子。强者说你是疯子，弱者说你是傻子，政治和解的呼声就陷入了“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尴尬境地。

鉴于对中国朝野对抗程度加剧的担忧，中国和解智库曾经公开发表呼吁，建议中共本着是制造法轮功问题当权者的角色，应立即着手展开同法轮功和解的议题，避免重蹈国共两党冲突的覆辙。此种呼吁连同其他的呼吁，全都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由此可见，政治和解在当下的政治境遇多么艰难。

此种情形，就类似于当年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调停的中间派，也就是代表第三力量的民主党派。当时国民党号称自己正统，是国家政权的合法占据者；共产党认为自己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代表，是将中国引入共产主义天国的带路人，是纯洁无暇至善至美的。国民党称共产党是匪类，是“共匪”，要

“杀猪（朱德）拔毛（毛泽东）”，共产党称国民党是“反动派”。两者之间不共戴天，自然无法妥协与调和。此时第三力量呼吁和谈的呼声得不到国共两党的响应，反而被国共两党作为拖延谈判、积极备战的筹码，互相打太极。等到毛泽东三大战役打下江山之后，第三力量就被用来装点民主联合政府的门面。继而等到资产阶级被肃清其财产被充公之后，毛泽东觉得第三力量也碍手碍脚，在反右运动中一并清除，右派人士也被当作敌人打得鼻青脸肿。

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是亚洲最耀眼的东方明珠，证券、期货交易所一应俱全，上海文化辐射了整个东亚，东京、香港等地均望其项背。即使是日本侵华，战时管制也没有改变中华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取得内战胜利之后，中共全面绞杀国民党残余力量，并废除了本来在中国存在的市场经济，实行专制的计划经济，然后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实行当然的专制统治。这一段历史大家都能看得到，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比过去皇权统治还要残酷的专制统治；专制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计划经济给中国带来的又是什么？是杀戮、贫穷与野蛮，是倒退、荒诞与疯狂。

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一直伴随着血腥与暴力，东亚文化中也潜藏着这种“暴力情结”。在中国传统的“王霸之学”，依承老子的“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演化成为为了某种所谓的神圣目的可将天下百姓皆作我用才是大英大勇的王者风范。经过后世革命主义者的发挥，暴力革命成了社会矛盾得以解决的必要方式、甚至还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

从实然层面来看，在极权社会暴力有其必然；若从价值层面来看，统治者以暴治民和民众的滥杀复仇都是非正义的。历史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民主政体倒不多见，多数是对本民族文化与经济的摧毁和新的极权体制的再度建立。也只有对极权统治和暴民行为从价值上进行否定，才可能跳出历史怪圈，向民主政治转型。

和谐社会政治伦理的重构

时空的转换总让人出其不意、眼花缭乱。

革命伦理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1976 年毛泽东驾崩邓小平执政之后，中国才逐步走出走出蛮荒的历史峡谷。时至今日，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得到确立，胡温政府还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施政理念。最近，中共新王储习近平在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之后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从大的格局上，中共似乎在逐步放弃革命伦理，向法治伦理转向。

然而没有经过政治和解这个步骤，社会的和谐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正因为没有达成政治和解，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如中宣部、政法委，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敌我观念、斗争观念仍然非常浓厚，仍保持相当高压的策略。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民主政治，这是不变的政治逻辑，中国的政治转型必然会到来。

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已经陷入制度性的发展瓶颈。2004 年爆发的改革争论，正宣告了这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是一场不正义的改革，是让中共权贵先富起来的改革。正如中国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幻灭一样，所谓的共产主义，不是全民均富，而是全民均穷，是谁掌握了实权，谁就可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

由于改革本身的非正义性，导致贫富悬殊加大，社会分层加大，而且民间积累的财富很难得到足够的保障，社会的矛盾在加剧。如果中共继续拖延政治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垄断问题，中国很容易滑向动乱或革命的边缘。这就像一个跷跷板，中共启动政改越早，民间和执政党之间的博弈就会进入互动的良性循环。正如国民党在台湾主动放弃“戒严”体制，回归宪政体制一样，台湾的转型显得轻松与自如，除了国民党有过象征性的道歉之外，民间对国民党并没有穷追猛打，国民党通过和平转让权力，象征性地完成自己的专制赎罪。台湾不仅没有出现东欧等国那样的政治动荡，甚至连韩国等国家民主转型之后的大审判都没有出现。

作为同宗同祖的中国大陆，台湾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意义。可见我们中华文化的元素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和解的元素。如儒家伦理的“中庸”、“和为贵”还是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只是被中共的革命伦理拦腰砍断，导致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被扭曲或埋没。

在中共内部也不断有温和理性的声音发出。如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曾经在主政中宣部时期，提出了“三宽”政策，即提出了“宽松宽厚宽容”的宣传方针；今年 3 月份，前中共中央党校的退休教授、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理事会的理事长杜光先生曾经发出《以宽容和解促进社会和谐》；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胡耀邦、赵紫阳更是中共党内开明派的标志性人物。

民间社会中，主张宽容与和解的声音也逐步有所放大。澳大利亚华人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如冯崇义

教授、丘岳首博士很早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和著述，并公开出版了《和解的智慧》一书。甚至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在冤屈尚未消弭，伤口还在作痛的时候，也非常宽容和大度地提出了“和解与宽恕”，前提是真相要得到揭示。

最近 10 年，大陆基督教家庭教会蓬勃发展，并在新兴的中产阶层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基督教的原罪伦理，直接推导出每个人自身的有限性不完全性，进而推导出平等博爱的教义，这种文化元素和倡导中庸伦理的儒家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和解文化的重要构成。

和解文化的根基在中国还很弱小，稍有不慎有再次夭折的危险，这一点取决于执政党自身的觉悟。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成熟的政府可以推动公民社会的成熟，反之亦然。如果中共不积极遏制革命伦理的昌兴，清除革命文化的恶劣影响，继续打压民间合法的政治性诉求，必然会导致民间的激进主义和革命思潮抬头，最终会葬送几十年的改革成果，将社会拖入动乱的边缘。

等我们回过头来，理性地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不难发现，恰恰是当年胡适、张君勱等人主张的中间道路、宪政治理最具有合理性。历史已经错过了多次机会，希望在 21 世纪的今天不再错过，让和解成为通向民主社会、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中國和解智庫北京召集人王光澤

2008 年 11 月 2 日于墨尔本



來賓發言：

政治和解： 理念、困境与现实途径 （美國）王军涛



我不远万里到这里是祝福一个伟大的事业，这个事业值得我们这样祝福。因为，如果有和解，中国就会避免灾难，人民会享受到和平，社会将有建立正义社会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我祝福这项事业，当然是对这项事业情有独钟，也认同这项事业的基本信念。然而，对一项事业有信念，并不是说这项事业不会失败。伟大的事业之所以是伟大的，不仅是因为其美好、而且因为其艰辛，能够实现一个美好但艰辛的事业，才是伟大的工作；最伟大的事业永远是有风险的探索而后成功的事业。政治和解，作为一个理念要想成为现实，必须正视自己的困境。

因此，据我看，此时，在这里，对政治和解的一个充满希望的祝福，还不应该仅仅是祝贺和赞美，而是揭示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探讨我们可能的方向。因此，今天我的发言不是贺词，反正你们已经有足够的贺词了，我想给这项事业在实践中注入一些生命力，即罗列出这项事业在中国可能面临

的挑战及我们解决这些困境的希望所在。

如果我们在这里仅仅因为一个理念是美好的和需要的，如果我们仅仅是揭示了这些美好和需要，就以为这个理念可以成为现实，那这个理念很可能不是伟大的，而是一枕黄粱美梦。

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确定，政治和解，对于中国人，究竟是个伟大的观念，还是一个墙上的饼或者水中的月；我们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毕竟错过太多的好理念、好制度和好机会。如果政治和解不能成为现实，那么，无论它多么正确、美好和需要，就是一张画在墙上的大饼，而和解智库的朋友和今天颁奖和祝贺的朋友，就是画饼充饥的笑料！

我不是在这里恶语伤害和解智库的朋友，而是想提醒朋友们，在实现这项伟大的事业时，最需要考虑什么。就在今年 7 月 11 日，我度过了自己的 50 岁生日。一位朋友想画幅漫画给我祝寿。我让他画一个人正在趴在墙上，艰难地啃着一张画在墙上的大饼。我对这个朋友解释，理想主义者如果陶醉在理想带给我们的美感，而不去真正正视和解决现实的困境以实现理想，那么理想主义者在旁人看来，不过就是画饼充饥的笑料。因为那个趴在墙上艰难地啃大饼的人，知道大饼是美好的和必要的，但是他永远得不到这张饼；他的执着和坚韧，不会让他显得伟大，而是让他显得可笑。我要这样一幅画作为知天命之年的生日礼物，当然不是为了幽默地自嘲。我是为了警醒自己，不要以为有理想，就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的结局除了伟大，还有笑料。

今天，我把这个自我警觉送给和解智库的朋友们，是分享我的人生经验，要争取让政治和解成为伟大的观念，而不是笑料。当我们看看今天的中国现实，政治和解这个词，太容易招致国人的攻击了；误解政治和解为笑料，可能还是较好的情形，许多人认为，政治和解其实是自欺欺人的麻醉剂；甚至有人认为，政治和解，在残酷的政治现实中，是别有用心心的毒药！

据我观察，在这些非议中，执意迫害反对者的暴君和变态反抗秩序的边缘人，作为恶意的诽谤者，是少数。多数误解者和反对者，是从政治理性和普通人的常识出发，否认这一伟大的理念在中国现实中的道义正当性和现实可能性。我们也许可以忽略前者，但是我们不能不正视后者提出的挑战。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常识和理性都否认一个观念，那么这个观念将不会得到百姓和民众的认同和追随。让我们看看，常识和理性是如何否认这一观念的，然后我们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境。

今天，我发言是以一个政治学者的身份和角度探讨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实践者宣示政治主张。

政治和解困境：常识与理性是如何挑战政治和解的伟大理念的？

我们所说的和解，是政治和解。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应该谁和谁和解呢？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再看看他们的现实处境和心态，然后问：他们会和解吗？

人类现代政治智慧体现在现代政治学中。现代政治学的推理基础是博弈论。博弈论，就是假定博弈参与者采取适宜可行的行动战略，理性地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博弈论在考察博弈参与者的处境和心态及可供使用的战略后，推演他们之间的战略互动，来确认他们会采取的最佳战略，进而推算博弈的最终结局。

政治和解的反对者告诉我们，在中国的现实中，和解是个欺骗性概念。它误导人们忘记或曲解人们的真实政治情境。因为，按照现代政治智慧，今天的中国是在暴政治理之下。

什么是暴政？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暴政概念是，某种残暴统治让人们无法生活下去。但是，现代政治学的暴政概念不是这样；现代政治学关于暴政的概念是，统治者未经被统治者同意而用国家暴力强迫被统治者接受统治。根据这个概念，当执掌和行使暴力维持秩序的公共权力被不受制约地垄断并随时会被滥用时，人们就生活在暴政统治下。中外关于暴政概念的区别是，中国传统的暴政概念其实是设立一个标准，用于判断什么时候会发生和应该发生改朝换代的起义造反；而现代政治学的暴政概念强调的是，暴政是那种没有制度空间确保可以修正治理中的问题，最终只有政治革命才能结束的统治。现代政治学关于暴政的概念具有某种预见性：一个没有可靠的制度制约和修正的统治权力，最终会导致腐败、暴虐、革命和内战。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不是暴政？按照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当然还不是全面的暴政；虽然局部和趋势是滑向暴政。但是，按照现代政治学的智慧，中国是暴政治理。因为，中国的统治者是没有制度可以可靠地制约的。有人争论，尽管没有制度可靠制约，中国现在的治理并不是暴虐无道的暴政。他们还可以举出中国也可以纠正一些问题。但是，现代政治智慧指出，在暴政治理中，由于好人好事是没有保障和坏人坏事没有制约。政治腐败和暴虐最终侵蚀整个治理系统。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暴政已经导致普遍的腐败和暴虐，整个社会已经在底层和局部处于内战状态。所谓内战，就是人们不再相信通过某种制度化程序讲理可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恶斗相互征服。

有时，距离太近常常使得我们无法对自己的社会作出准确的判断，因为我们对罪恶和荒诞习以为常，把常识中的标准忘掉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我们已经很难让我们的孩子相信和理解那时的荒唐和怪诞的罪恶。今后，我们很难让人们理解，今天暴政下的罪行是如何得以发生的。

那么，在暴政中，我们能期待博弈的双方采取什么政治行动战略参与博弈呢？政治和解会是他们的选项吗？他们能接受政治和解的建议吗？初看起来，朝野双方都不会考虑政治和解作为政治行动选项，政治和解几乎是不能的。简单地说，从政治理性行动者的角度看，政治和解，只有在博弈双方谁也吃不掉谁，或者博弈双方谁也没有把握吃掉对方，或者是博弈中胜方面对胜利多要付出的代价犹豫不决时，才有可能成为政治行动策略的选项；只有在博弈双方选择政治和解比选择不和解政治都得利更多时，博弈双方才会选择政治和解。而且，只有博弈双方都选择和解，和解才会发生；一方选择和解，和解都不会发生。显然，在中国的政治暴政中，博弈双方如果理性地选择行动，都还不会选择政治和解作为行动策略。

首先，统治者不会考虑政治和解，因为他们不需要和解，也不能和解。作为统治者，他们现在完全可以控制局势，镇压任何反抗，不需要与被压迫者和解。从另一个角度看，任何和解的姿态及表现出的慈眉善目，都会削弱统治者，因为这会被认为向统治者示弱，这会解除人被统治者对暴政的恐惧，从而提出统治者不能解决的问题：腐败和暴虐的行为及后果。暴政需要人们的恐惧心才能维持。当人们不再害怕暴政时，不仅现实问题将因为说服工作的难度而难以解决，而且一些历史旧账也会被翻出来要求重新解决。在免除恐惧的讨论中，现实和过去的问题、过失和罪行，会导致人们追究责任，希望更好的治理，从而要求更换统治者。因此，从政治理性行动的角度看，暴政中的统治者不会接受政治和解的理念，更不会作为自己的行动选项。现实中，政治理性使得他们不断改进镇压机器，强化镇压的手段，

其次，暴政下的被统治者也不会接受政治和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甚至不会想到，政治和解可以是个行动战略选项。中国的被统治者处于什么境地？在政治博弈中，他们可以选择的行动选项是什么？目前，中国的政治被治理者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业精英，他们凭借着一技之长，也可以分享腐败发展的部分成果。另一类是广大民众，他们在经济上有些许改善的同时，但承受着发展的主要代价，是暴政的主要受害者。在暴政中，所有的被治理者的尊严、安全和权益，都没有可靠的保障。现在，经济的贫困和匮乏，不是主要问题；政府的腐败和滥用职权导致的不正义和暴力虐待，是被治理者深受其苦的主要灾难。这些问题在严重快速恶化扩展。那么，人民面对暴政的主要反应是什么？有四种反应。第一是忍耐；这是主流反应。第二是以暴抗暴，这是这些年发展迅速的反应形式。第三是维权，试图在现行制度框架中解决问题，这种形式前些年人们既很大希望，但是这些年遭遇的挫折，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再抱希望，这种反应形式正在成为一种反抗形式。第四是革命，结束现在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多数革命者不一定自称是革命，也不是暴力的主张者；但他们相信，只有更换制度才能根本建立可靠的安全、尊严和权益的保障。因此，对于中国被治理者，要不要反抗暴政以及如何反抗暴政是主要的任务。政治和解，对于他们是太奢侈的行动选项。他们根本不认为，他们有实力和可能去宽恕暴政的施暴者。也就是说，政治和解，还在他们正常的常识理性思考范围之外。

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有一天中国的民众有实力和机会去处理今天的治理者，他们会怎样？就现在他们出于绝望的愤怒，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清算和报复。我知道，主张和解的朋友觉得政治报复不是高尚的情感。但是，这既是常识理性、也是常识正义的选择。其实，在多元的人类社会中，宗教信仰和美好精神不是社会秩序的规范，法治才是真正的秩序基础；而法治中的正义原则，就是理性、公平和适当的报复：你制造了一个伤害，就要接受一个相等的惩罚。宪政秩序的基础是常识理性。

在暴力的迫害下，他们之中的积极行动者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有些偏激。对于和解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暴政，对于民间政治文化的最大毒化，就是让和平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和秩序遵守者，显得无能和可笑，把他们在民间运动中边缘化，甚至出局。暴政，会让民众崇敬、相信和追随激进主义，产生暴力崇拜，从而为以暴易暴创造条件。不论我们多么不喜欢暴力，我们必须看到，这也是正义的选择，是常识理性智慧的选择。

总之，在中国处于暴政情境中，朝野都不考虑政治和解，而且这不是少数迫害狂和边缘人的偏激情绪，而是多数人是从小常识和理性出发作出的选择；在理性和常识的主导下，暴政会使得政治博弈变成暴力较量，这里少有和解的空间。

政治和解前景：怎样在中国创造政治和解

如果中国的朝野在正常的思维中，都不接受或没考虑政治和解，那么，政治和解怎样才能成为中国政治的前景？我认为，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根本的政治转型机会出现；第二，要有宪政民主

的政治框架；第三，要有一批投入和敬业的志愿者做出努力。

暴政的实施是以稳定为条件的，当暴政不能维持了，治理者对被治理者的力量对比将发生变化。传统社会的暴政一般是被反叛的暴力颠覆的。现代社会的暴政是可以通过和平过程转型的。对第三波民主化中的政治转型作比较研究表明，转型可以有三个阶段：由于出现严重问题，导致公共危机出现；进而引发大规模风潮；统治集团分化，改革派动员民众支持，启动转型。这里，有人质疑，为什么统治集团会分化？现代政治分析揭示，不是理念、而是政治利益，会导致统治集团分化。这是马基雅维里解释模型，是最大化自我利益的理性选择的结果。挑战的利益和机会主义。

一旦转型机会出现，选择替代性制度就是未来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宪政民主会在两个方面促成和解文化的产生。宪政的多元和法治，使得任何政治相互报复都是非常谨慎的，几乎是象征性的；人们在程序中的辩诘，会使得人们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和善意。此时，和解可以有宽松和理性的环境。而选举政治，会让中派政治文化兴起，增强温和情绪，边缘化激进思潮。

无论制度转型还是宪政民主，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创造和选择的结果。为了出现上述两种条件，我们需要第三个条件，这就是要有一批有智慧的人在政治和解还显得不可能时，就提出和解理念，坚守和解精神，研究和解智慧，积累和解经验，驾驭和解机会。

在提出和解理念和坚守和解精神方面，冯崇义教授、中国和解智库和今天的齐氏基金会，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并在中国众多的政治意见光谱中，成为一个亮点。我认为，下一步，应当在继续凝聚认同政治和解理念和具有宗教热忱的人们同时，在研究和解智慧和积累和解经验上下功夫，同时注意策略和操作，为驾驭政治和解机会而作准备。因为，和解不能仅仅是理念；如果这样，和解就是画饼充饥了；和解必须是一项政治工程，要设计和建造。

研究和解智慧，要系统地开发、搜集和传播人类政治史上的政治和解的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和各种理论、战略和方案，建立资料库。要研究、搜集和介绍与政治和解相关的学科和专业。

积累和解案例，就是要介入政治和解过程，积累中国各种情形下促进和解的经验，培养一支队伍。工程建设成败，是案例的积累，不是理念的宣示。

驾驭和解机会，就是要注意培养与主要政治力量及领军人物的战略关系，不轻易得罪任何主要力量，同时要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政治姿态。例如，在第一阶段，要在第二阶段，要促进政治转型的出现，不反对大规模政治风潮。在第三阶段，要号召和支持统治集团中有改革和宽容心的力量，引导他们打开体制，动员民众，促成转型出现。当体制转型启动时，要防止多数暴政，力挺宪政民主。

我知道，做到这些，需要和解智库的朋友创造一个奇迹。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工作，政治和解作为理念，对喜欢它的人而言，就是水中月，镜中花，而对于反对者而言，和解智库的朋友就是画饼充饥的笑话。我相信，中国的政治转型，会产生一批自己的创造者。我衷心地希望，和解智库可以成为其中一员，为了我们这个饱受暴力折磨的民族。

我个人在此承诺，不论作为政治活动者，在政治实践中我作怎样的政治定位，我都会作为一个和解智库的朋友促进你们的事业。因为，因为在这项事业的背后，有我认同的伟大理念。

2008,11,2.



和解与革命：抉择的关键时刻正在逼近 （悉尼）丘岳首



感谢齐氏文化基金会把首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给“中国和解智库”，作为成员，我当然有一点工作被肯定、呼唤有了知音的喜悦，但更多的心情却是惭愧——我们限于人力物力和时间，活确实干得太少了。

我珍惜今天的颁奖会，是要借此机会把我对当下中国局势的一些思考与朋友们作个交流。我感觉到，和解与革命赛跑的步伐正在加快，在两者之间抉择的关键时刻正日益逼近，留给中国朝野各方力量慢慢琢磨细细思量的时间的确不多了。我分三点谈谈我的思考。

一、在社会撕裂和改革共识破裂面前

上访潮、拆迁户、黑窑工、黑监狱、瓮安“6-28”暴动、杨佳式“讨说法”、“人肉炸弹”等等乱象，已经清楚地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条社会裂痕，严重的是，这些裂痕呈扩展延伸趋势；

“改革已死”、“动力资源耗尽”、“进行第二次文革”、“中国已进入反改革时代”等等话语，已经广泛掺入对改革一边倒的美化和颂歌，使改革成为一个人言人殊，饱含众多抱怨不满的话题。

我并不同意对改革的过多抹黑，改革 30 年确实积累了不少现代化国家所需的物件，也总体上提高了中国的 GDP，在一些方面改善了国民的生活质量。社会存在如此之多的严重问题，病根不在改革开放，而在死守落后的政治体制。由于 30 年改革来路从一开始就是跛足走过来，至今几个特殊利益集团和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紧张对峙的局面已然形成，发展趋势堪忧。

一方面，“权力寻租”勾搭下的大规模圈地圈钱，红与黑社会势力联手的强抢豪夺，不但把社会的大体撕裂为狼与羊的二元世界，也已经把“杨佳”们逼上了“讨说法”和“人肉炸弹”的不归路。改革早年的争论还是“抢来本钱做生意”、“化公为私”等是不是“为富不仁”，现在遍地的有毒食物把人们的神经绷紧到能不能躲过“谋财害命”上来。人权恶性事件不间断发生，剪不断，理还乱；成规模维权抗议此起彼伏，按下葫芦起了瓢。重庆近期“扫黑”80 天就逮捕近万人，再往前一步，人都不知往哪里关了。

另一方面，金融海啸正掀去遮盖中国尖锐社会矛盾的面纱。整个外贸出口量急剧下降，明年很可能出现负增长。庞大数字的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外资不但再无力注入而且开始外撤。与此同时，股市崩盘，楼价下跌，失业大军涌向街头，成为提高社会风险系数的新生力军。

多年前王力雄先生就有一个“车轮理论”，说社会的稳定如同行驶的车轮，必需保持一定的速度，才能平稳。我们看到，一般正常社会（如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有 2、3 个百分点社会就稳如磐石，中国社会却至少得保 8，因为它落伍的政治制度衍生出一个巨大的官僚贪婪胃口。正是这个庞大的胃口，吞食了改革的大部分物质成果，吞食了金融、电力、通讯、土地等最肥领域的厚利，当然，最终它也要在吞食掉社会弱势者的同时吞食掉自己。

种种迹象显示，“紧张对峙”演变为“剧烈对抗”的可能性在快速上升。墙内墙外严峻的形势逼迫中国朝野在未来几年必须真正正视和解与革命的问题并就此作出抉择。

首先是当权者（也是暴富者）艰难的抉择：要么让渡部分既得利益和公权力，换取和解共生；要么继续用暴力维持多几天的酒醉金迷，等待共死双输。

其次是民间社会同样痛苦的抉择：是否愿意对忏悔予以宽恕？可否以放弃清算去与认罪作个交换？从变革成本计算，是否应该减少当权者对民主的恐惧，以体面的谈判妥协促成社会早日转型？以暴易暴把持枪者逼到墙角让他们掏枪决斗是不是上策？能否赢？

面对众多暴富者的疯狂掠夺，为数不少当权者的平庸和冥顽不化，我无法断定革命是不是最坏的选择，但我清楚地知晓，革命食人（万千鲜活美好的生灵涂炭）、食物（大量辛苦积累的器皿毁灭）、吃言（枪炮声吞没理论言说）。这头巨大的怪兽一直与中华民族形影不离，那大腹不知食掉了多少我们民族儿女子孙。

要不要革命或许是个伪问题，因为革命要来它不期而至，你我都无法阻挡，但如何运用我们这代人的智慧来尽力避免你死我活的革命却绝对是真问题。我们能做和必须做的，就是尽我们个人绵薄的力量并把这些力量合成起来去争取变革社会的最不坏运作方式，去减免流血，降低变革成本。我们坚信，政治和解是解决观念纷争的最佳选择，应该成为中国人健康政治生活的常态。

中国近代百年有三个重要十年，1917年、1989年的前十年和眼下前后的十年。前两个十年的生动局面连同社会和解的难得机遇都被枪杀了，眼下前后的这个十年得益于网络和全球化也具有一定的活力，但其凶多或吉多的前途未卜。人力尽，听天命，人有命运，国有国运，老实说，中国人多命不好，一个原因是国运屡屡不佳。应补充提出，1937年后的一个时期也是国人停止相互残杀、强势者善待弱势者的难得时期，我想中共中人应比我等更清楚那段历史，虽然他们出于某种恐惧不愿多提那段往事。

二、经由社会和解达成新的社会共识

如果说改革共识破裂，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却是一个有望在朝野间形成的新共识。经历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极权霸道，中共今天的思维愿意朝“构建和谐社会”靠拢实属不易。然而，问题就在于对“和谐”的解读朝野间也没有共识。巨大的差异在于：在朝的“和谐”意图显然是要将社会稳定在现有制度的框架内——我垄断权力和资源，主导法律与舆论，给你生存权和少量话语与参与的空间，我们就这样好好“和谐”吧。

包括“中国和解智库”在内的民间组织和人士所理解的“和谐”至少包涵有：政党轮替和票选政府的政体框架；分立制衡的权力构架；独立自主的司法和媒体；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和公平竞争；公民结社、言论及示威抗议的自由；良好的福利、医疗和教育等。我们理解的“和谐”，不是整齐划一沉闷死寂的“和谐”，而是各种声音有序的组合互动，各派力量有效的协作制衡，是各党各派公开地争权夺利、各种宗教信仰互竞高低、各类思想学术争奇斗艳、各路舆论媒体尽显神通、国人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样一种充满良性互动活力的稳定秩序状态。

没有社会的共识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经由社会和解达成新的社会共识则是走向社会和谐的康庄大道。

“和解”议题了引起很大的争议和误解。我这里申明我们对和谐的理解并指出没有社会的共识就没有社会的和谐，也是要回答对和解的一个主要误解——误以为和解是要国人安于现状，忍受现状，甚至是为官府分忧。以下一些朋友对和解议题的疑问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那些民工、矿难家属、爱滋族、拆迁户、流亡藏人如何跟正在压迫剥削他们的政府和解？政府对土改、反右、文革、天安门的屠杀还没有承认错误，继续隐瞒真相，向受害者、幸存者赔偿道歉，这时就奢谈和解？（廖天琪：劳改基金会远征香港——“同一个梦想”文化节后记）“公民力量”近日的一份文稿也指出：从原则上我们支持中国社会就“六四”等历史问题最终达成和解。但是，连真相都很没有搞清楚，怎么能谈和解。二十年了，屠杀责任当局没有表现出半点解决问题的诚意，对死难者家属还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打压，政治改革寸步不行，人权灾难一个接一个，“没有公义的和 平不是和平”（图图语）。和解首先是为强者准备的仁义道路。在受害者还是没有能力诉诸法律让加害者还以公正的弱者时，让他们提出和解的诉求是不仁义的。强者的开明和让步与弱者的宽容和坚持是和解成为可能的关键，而第一步必须也只能由强者迈出。

其实，“中国和解智库”高扬和解理念的民间立场是鲜明的，政治指向是清晰的，那就是以真相换谅解，以忏悔换宽恕，加害者停止作恶施暴，对受害者道歉赔偿。同时，我们也呼吁民间社会调整完善自身的思维、话语和行为方式，而这也是公民社会的要求。在我们的系列文告中，已多次强调选择和解与否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拥有巨大财力和武力资源的庙宇高堂，强调当权者顺应时代潮流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妥协代替镇压，这样做不但对民族子孙功德无量，也是他们对自身的救赎。

但我认为，我们不能等待当权强势者“表现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再来谈和解，相反，现在加大力度宣扬和解理念，就更能催促和迫使他们早日拿出这种诚意。我们指出和解的主动权在拥有巨大武力

和财力资源的当权强势者一方，并不就是说民间在和解与否的抉择上只有被动的份额，并不就是说只有当局走了第一步、民间才能走第二步。我认为，即使在当局无愿和拒绝和解的情形下，也并不妨碍民间率先呼吁、提倡并努力实践和解。事实上，已有许多受打被压的民间人士连同和解智库诸君的言行，已经就是在行使某种“和解的主动权”——主动向强势者表明了绝不同态复仇、绝不以暴易暴的态度，主动提出并探索一种新的政治转型思路，不是吗？同样，达赖喇嘛近日在与中央政府谈判的姿态和表现上，也显示出一定的主动性。我觉得，民间健康理性力量能否快速增长从而加大主导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对于和解路径的选择可能更加重要。

三、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政治和解前景乐观吗？

我一直将政治和解看成社会和解、族群和解的前提条件。那么，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政治和解前景乐观吗？我的回答是明确的：政治和解是既可欲也可期的。我的理由如下：

1、政治和解实践成功的先例与日俱增

先前南非种族隔离的消失，巴以和平的进展，台湾 228 惨案的平反，韩国光州受难者的昭雪，北爱尔兰宿敌的握手……近时肯尼亚对立政党和平协议的达成，尼泊尔新政府的重组，巴基斯坦危机的化解，台海两岸的互动，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代表的对话（虽然未有实质结果）……我不想在此详述这些政治和解实践成功的先例，我想强调的是，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从南欧、东亚、拉美到东欧发生的所有国家政治转型，无不采取了谈判、协商、让步、妥协的方式，几乎没有一例是通过“暴动”、“起义”、内战或大规模流血事件等传统反抗方式而实现的（只有尼加拉瓜是个有争议的例外），这一普遍现象应该发（中国）人深思，令（中国）人鼓舞。我还愿在此引述两位曾是军政强人在面对政治和解接受与否关键时刻的讲话——

波兰前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新总统交出权力的前夕向他的国家发表“告别讲话”：“我只请求一点：如果时间没有熄灭某个人心头之恨或者不悦，那么就让它们首先向我发泄吧。”

不久前把权力交给国会的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发表全国电视演说，虽然他认为反对党派对他的破坏宪法和行为不检等指控站不住脚，但是他说：“现在不是要更多对抗的时候”。

如此强硬的当权者都在世界潮流的裹挟下走上政治和解之路，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对中国的政治和解前景悲观？

还需要指出，上述政治和解实践成功的先例不全都发生于我们国情文化圈外，它们也成功于文化习俗与我们同样或近似的区域内。

2、中共领导层的成分发生巨大变化

中共当权者确有为数不少的平庸和冥顽不化者，但不全是胸无大志的宵小利禄之徒。我刚回母校参加研究生毕业 20 周年聚会，现任大学校长、书记就是我们这一届同学，不少同窗已进入权力决策高层在省、厅、局级的任上。他们的脑袋或部分被屁股改变，但打死我都不会相信这一大批在“紫阳当空”时吸收许多自由气息的官员愿意死心塌地为专制政权续接香火，愿意心甘情愿为没落的政治制度殉葬。不错，他们也是既得利益者，这多少消磨去他们变革社会的愿望和干劲。但就我们祖先的教诲而言，功名利禄，名在利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想他们也不愿落个平庸小人的骂名。利没得到时很美妙，多了也就没了感觉，在条件合适时，在机会到来之际，他们定会为自己的美名也为社会的转型作出明智的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毛时代结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政治文化已经发生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并不尽如人意）也增加了政治和解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宏观政治因素比中共领导层成分的变化更具实质意义。

3、中国不能游离于全球化时代之外

有毒食品通过贸易出口祸害于世，再清楚不过表明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世人非常清楚，要杜绝这类祸害就必须杜绝这类祸害产生的根源——中国的政治体制。国际资本是垂涎中国市场因而也多少会迁就中国现存的这种制度，但当生命安全成为问题时，利润就会让位于安全感。

为了安全，也为了利益，全球已经联手合成一个无形的巨大驱动力，悄然改变着中国，促使她成为全球化利益的相关者和分享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外资，中国的产品需要世界的市场，无论从自身的利益从世界的声誉，中国都必须作出制度改革而且无法再拖延。在此国际压力和内在需求的情势下，找到一条朝野都易于接受、双方都愿走的社会转型路径就是当务之急。

“中国和解智库”在这条路径的寻找努力中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设性意见，我们的资源和能力有限，但我们的努力是尽心的，是真诚的、也是善意的。至于我们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当权者，能被民间社会认同，只能交由时间和机缘来作答。

“中国和解智库”同仁认定政治和解既可欲也可期，那是因为我们深信，现阶段不少国人将不同政见者坐到圆桌上共谋政事看成痴人说梦般的难以企及之事，再过一个历史时段回头来看今天我们的这些追求，他就会觉得这其实是再平常正常不过的事。

再次感谢齐氏文化基金会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和解智库”海外召集人 丘岳首

2008,11,2.



贺词：

黎 鸣

（哲学狂人，中国最尖锐的思想者）



要和解，首先必须会理解；

要理解，首先必须能拥有共同的真理；

世界上最伟大的真理，是人人平等，人人共同人格上的平等；

因此，为了达到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各宗教、各阶级、各群体、各个人之间的和解，首先，让我们一起共同来赞美，全人类人人平等的伟大的真理吧！

張三一言

（香港独立政治评论员）



謝謝你們的努力和欣賞你們有成效的工作。

在一个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国土上，“社会和解”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前提需要“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可在当下中国，能够做到这两条实在太难了。如果有了这两条，何以会出现毒奶粉事件以及报道延宕。所以，中国和解智库的生存条件和工作环境的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和解智库还是在实实在在地作了很多工作，为中国走向和谐社会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韩三洲（北京自由作家）



衷心祝贺“中国和解智库”获颁“推动中国进步奖”！
以智库成立以来的诸多努力来看，这应是一种实至名归的荣誉！

野 火

（廣州，独立中文笔会作家）



谋求政治和解是未来中国体制转型的一条代价最小的路径。而且从今后相当长的一段路程或形势着眼，和解，也是唯一可以寻求实现的变革蹊径。因为任何追求暴力革命的“正确选择”在“习惯了做奴隶”的社会条件下都是不太现实的。何况占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底层包括工农阶层，也不尽认同那种带来两败俱伤的暴力革命手段。因为他们也知道，任何以暴力循环为依归的社会变革，都不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感到幸福与安宁。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曾指出的：“当你采用暴力来做你的诉求时，你用非暴力诉求获得的支持就极大地缩小了。”是的，那么作为素以关注底层、追求公义等为指向的良心知识分子，是去思索一条社会转型震荡代价最小的和解之道，还是寻求以暴易暴的暴力循环之途呢？其答案显然不言而喻。由是言之，政治和解、多元兼容无疑才是一条走向理性的智慧选择。

茅于軾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和解智库在不利的环境下，在很短的时间里，在人力物力都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获得明显的效果，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这次获得澳大利亚齐氏文化基金奖，当之无愧。

Kristin Kupfer

(奥地利《PROFILE》记者 KRISTIN KUPFER)



面对世界，包括中国社会的竞争，奋斗以及仇恨精神，中国和解智库为了中国与世界将来和平发展做了不可缺少的贡献。宽容，公正以及多元化就是中国和解智库所代表的价值。希望将来更多人士与组织被中国和解智库工作感动而把和解的精神带到中国与世界社会的每一个处。

李大同

(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



宪政国家与公民社会相辅相成。在当今中国，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健全，极其需要以理性、积极和负责的态度做事的组织和个人，“和解智库”可谓先行者。值和解智库荣获“推动中国进步奖”之际，特表达诚挚的祝贺并祝愿你们的事业为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王力雄

(中国著名自由作家、独立思想者)



我赞成和解。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和解不是基于愿望或劝说的某种态度，而是一种机制。自觉的机制出于智慧，这正应该是和解智库之所长。祝好，更上层楼。

段振坤

（中国著名三民主义研究和传播学者）



祝贺和解智库获得"中国进步奖"，愿和解智库为中华民族之新生和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陈奎德（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纵览中国》主编）



欣闻和解智库声誉日隆，首先，我谨以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以及《纵览中国》网站的名义，对于中国和解智库荣获齐氏文化基金会颁发'中国进步奖'，表示热烈祝贺。几年来，和解智库在艰难环境下，做了大量卓越的工作，贵智库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在正义的基地上，审视历史恩怨；在宽容的精神生态下，达成社会和解。你们在推动中国的正义、进步和宽容方面，取得了成绩。期望将来联手各方，和衷共济，促成中国更加自由、公正和开放。

龙应台 （台湾龙应台文化基金会董事，台湾著名作家）



家貞，你真了不起，成立了基金會。在天上的齊爸爸一定在微笑。

我將你的電郵給了我們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以後你就會收到我們的訊息，做為參考。希望能给你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幫助。

我很欣赏齐氏文化基金会'愿意为中国的进步做一点事情'的宗旨，祝首届颁奖会成功，并祝成长顺利。

小 乔（中國，自由撰稿人）



祝贺"中国和解智库"获得齐氏文化基金会颁发的首届"推动中国进步奖"殊荣！并贺颁奖活动圆满成功！

中国现代化转型迄今已历时百年余，其间遭逢无数艰难曲折，国人付出种种惨烈代价，但至今除台湾等少部分地区外，民主自由之曙光仍迟迟未见于华夏大地，实为令人痛心疾首之事！

"齐氏文化基金会"发起人弘扬先人之德，虽处身海外而不忘故国，尽己之力推动中国文明进步与民主自由；"和解智库"力倡民族、宗教、文化和解，孜孜以求民族和解、发展之路，此皆中华之幸。昔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图图在主持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工作时有言："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图图主教与南非当年朝野有识之士，以真诚、高贵的悲悯情怀和理想主义精神，努力揭示真相，反思历史，引领南非民族走出历史的悲情迈向新生。

寄望"齐氏文化基金会"与"中国和解智库"诸君再接再厉，为达成中国全民和解，建设一个真正和谐、团结、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尤望当权者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勿被动等待社会矛盾激化"洪水滔天"不可收拾的一日来临，而能勇敢承担自己对历史、对民族未来的责任，反思历史真相，检讨执政得失，向人民真诚忏悔，以达成全民族的和解、谅解，共同走向新生，建设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繁荣、和谐的新中国！

丁 东（北京，资深编辑、独立思想者）



谨向齐氏文化基金会的成立致以诚挚的祝贺！
我们都希望看到中国的进步！路漫漫其修远，让我们不懈求索。

武宜三（香港五七學社理事、自由撰稿人）



齊氏文化基金會創辦人齊家貞女士和各位理事，齊氏文化基金會首屆“推動中國進步獎”得主中國和解智庫代表邱岳首先生、王光澤先生，各位嘉賓：

本人武宜三向齊氏文化基金會首屆頒獎大會暨研討會表示熱烈祝賀，向為推動中國進步而不懈努力甚至作出巨大犧牲的各位朋友表示崇高敬意。

祝大會圓滿成功！

陈子明（北京，改造与学习网站主编，大陆民间思想界著名领军人物）



以坚韧执着的抗争壮大公民力量；以理性善意的态度展开政治对话；在历史真相与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解。与中国和解智库、齐氏文化基金会的同仁、朋友们共勉。

王丹（美國，宪政协进会主席，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哈佛大学东亚史博士）



中國的社會轉型需要公民自己的努力，
我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當權者身上。
齊家貞基金會以來自基層的力量，
追求公民意識的形成，
值得大家的鼓勵與支持。

祝賀齊家貞基金會舉辦了這樣一場有意義的活動。

蔡咏梅（香港开放杂志责任编辑，自由撰稿人）



親愛的家貞

當聽聞你欲用你父親遺留給你的一筆錢籌辦齊氏文化基金會時，我真的很感動，感動於你對苦難中國的不離不棄和那種自願擔當的責任感，盡管你在坎坷半生後已在一個遠隔重洋的美麗自由的異鄉有了完全新的開始，本可以無憂無慮的享受新的人生，何況你本身並不是富有的人。我也感動於你對你的亡父的那份拳拳孝心，還有什麼比盡心竭力完成父母正義的遺願更能表達兒女對父母的孝思和緬懷？作為現代社會的一位公民，作為一個含冤受屈父親的女兒，家貞，你是我的表率。

對你的孝行義舉，我會永遠支持。現在你的基金會終於正式運作了，看到有這麼多朋友支持和幫助你，我為你高興，並衷心祝賀。

家貞，讓我們一起加油吧！

杨建利

(中国公民力量发起人,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名誉主席)



尊敬的齐家贞女士暨齐氏文化基金会：

颁发首届“推动中国进步奖”是推动中国进步的一件大事，在此，向您和获奖者王光泽先生、丘岳首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

中国共产党是利用人心中的恶成功地夺权和维持统治的，此特点至今未改。中国的真正进步就是要摆脱这个思想和实践，要靠调动人心中的善来完成。而您和获奖者是中国文明进步这条路上的坚定的跋涉者。希望“推动中国进步奖”的颁发能激发更多中国人的热情增强更多中国人的信心，使他们成为您和获奖者的同路人，一起走这条和平、艰辛而崇高的道路。

杜 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前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



祝贺“中国和解智库”荣获“推动中国进步奖”

欣悉“中国和解智库”荣获“齐氏文化基金会”颁发的“推动中国进步奖”，甚为感奋！

中华民族向来有宽容和解的优良传统，道家的“为而不争”、“上德若谷”，儒家的“和为贵”、“仁者爱人”，墨家的“兼相爱”、“泛爱万物”，佛家的“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等等，都包含着和解、宽容、仁爱的精神。所以李大钊把东方文明概括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东西文明根本之异同》）。

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更由于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整个社会笼罩在阶级斗争的迷雾里，和解宽容的民族精神被弃如敝屣；近几年来，更由于贫富两极分化，官民矛盾激化，使社会到处都呈现出不和谐、不安定的景象。执政党前几年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明智的。而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提倡宽容和解的精神，宏扬和气，消除戾气，发展人性，克服兽性。这是中国现阶段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中国和解智库”成立一年多来，本着“以真相促正义，以正义促和解，以和解促和谐”的宗旨，努力开拓，提倡对话，做了许多有利于推动和解、发扬宽容精神的工作。“齐氏文化基金会”把“中国进步奖”授予“中国和解智库”，是对智库的肯定和支持。我作为智库的顾问，谨向“齐氏文化基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希望“中国和解智库”能够团结更多的志士仁人，共同努力，在推进社会和解、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來稿發言：

胡平(《北京之春》主编 评论家)



欣闻齐氏文化基金会设立推动中国进步奖，并把第一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中国和解智库。对此我表示热烈祝贺。借此之际，我打算谈谈社会和解的问题。

当一个国家由专制转为民主，它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旧体制过去犯下的错误和罪行。南非创造性地采取了真相与和解的方式。如图图大主教所说：

“我可以想见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罪犯或其后代承认已经发生过的残酷事件，受害者的后代以宽恕作为回应，同时应采取措施对影响依在的惨案的受难者给与哪怕是象征性的补偿。”图图十分强调经济赔偿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有人偷了我的钢笔，然后请求我宽恕他，那么他必须退还我的笔，否则其悔过和坦白就等于零。只要条件允许，坦白、宽恕和赔偿应该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

谈到今天的中国，我们知道，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欠下了人民两笔债。一笔是政治债即政治迫害，一笔是经济债。

经济债又有两笔帐，一笔是毛泽东时代灭私充公的血腥共产，一笔是改革开放以来化公为私的权贵私有化。从原则上讲，政治债比经济债更恶劣，只有偿还了政治债才可能偿还经济债。

但是从操作上讲，偿还经济债比偿还政治债更困难，在经济问题上实现和解也要比在政治问题上实现和解困难得多。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写下一句惊世骇俗之语，曰“丧父之痛易忘，夺财之恨难消”（“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此话历来遭人诟病，我也不以为然。不过，对此话略作变换，或许可引出另一番意思。

生命不可替代，财产可以转移。毫无疑问，丧命要比夺财严重得多，原因之一是财产的损失多少可以赔偿可以纠正，生命的损失却是不可赔偿不可纠正的。财产可以失而复得，人却不能死而复生。再有，从事后追究惩罚的角度看，张三杀了人，张三死了，你不能抓张三的儿子抵命；但若是张三抢夺他人的财产，而他后来又把财产留给他的儿子，那么，张三死后，我们完全可以找张三的儿子还这笔帐。父罪不应子抵，父债却可子偿（只要父子间有财产继承关系，而这是很普遍的）。由此就引出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结果：对于杀人这种大恶，在拖过若干时日之后，人们无法惩罚，无法对受害者给予实质性的补偿，因而不得不放弃追究（或者说只能进行象征性的追究）；对于夺财这种较小之恶，即便经过若干时日，人们仍然能够惩罚，仍然能够对受害者给予比较实质性的补偿，因此会追究到底。

乍一看去，这不是很荒唐吗？这不是“丧父之痛易忘，失财之恨难消”吗？人们对较小之恶穷追不舍，对更大之恶反倒轻轻放过。其实，这不是荒唐，这是无奈。阿伦特说：“我们无法宽恕那些我们无法惩罚的人，我们无法惩罚那些我们无法宽恕的人。”简单地说，杀人之罪，一代之后，人们就很难追究惩罚；夺财之罪，即便经过两三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有些却依然是可以追究惩罚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里警告君主“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是有道理的。同样是转型正义，经济清算要比政治平反困难百倍。

第一、偿还政治债主要涉及良心犯和政治犯。在今日中国，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数虽然也是个惊人的数字，不过在总人口比例上只占较小的比例。相比之下，在经济上受损害的人就多多了。偿还经济

债涉及千家万户，在权贵私有化的过程中，大多数民众都遭到剥夺和损害。尽管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繁荣，多数人的生活状况都有改进，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是被剥夺被损害的；而在贫富悬殊的刺激下，贫困者的被剥夺感尤其强烈。

第二、一般来说，政治迫害的责任承担者比较少，因为政治迫害是出自最高当局的决策，其他大小官员只是执行命令。经济问题就不同了。虽然现行体制为官员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但腐败不腐败毕竟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上级的命令。一个参与镇压八九民运、镇压法轮功的官员可以说是邓小平、是江泽民叫他镇压的，但是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员不能说是江泽民、是胡锦涛叫他腐败的。

第三、政治犯是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受难，自由民主的实现本身就是对他们所受苦难的最大补偿，因此，政治犯及其亲属通常都比较宽宏大量，比较能宽恕放下屠刀的敌人；可是，那些遭到权贵们抢劫的大众，一旦得到讨还财产的权利，他们凭什么要自动放弃而不去尽力讨还呢？南韩的全斗焕，印尼的苏哈托，都曾经残酷镇压民运，但后来他们在民运的压力下让步，人们就赦免了他们以往的罪行；可是不久后他们又都因经济腐败而送上法庭。可见，在财产问题上，一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可以想见，伴随着政治的开放或松动，有大量民众，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所谓弱势群体，不会接受财产分配的既定格局，他们会强烈地要求重新洗牌，对以往的经济不公正进行矫正。在这一矫正过程中，势必将有大量官员受到追究和惩罚。

既有的财产分配格局将经历大规模的震荡，从根本上被打乱，新的、能被广泛接受认可的经济秩序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才能逐渐确立。和未来中国这场经济乱局相比，俄国和东欧等国曾经出现的所谓经济乱象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共当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几年前就有人提出赦免“原罪”，即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在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式。明眼人一望而知，这个赦免令与其说是对民营企业家的，不如说是对政府官员自己的。

因为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十之八九就是和政府官员相勾结进行权钱交易，而在这种交易中，政府官员才是“拿大头”的。

中共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夺公共财产，然后又以政府的名义自己出来宣布对自己以往侵夺公共财产一事不予追究，自己赦免自己。这种赦免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在于谁有权赦免？官商勾结侵夺的是公共资产，唯有人民才有赦免权，只有在实现民主转型后，通过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方式而作出的赦免才有意义。

去年5月30日，中纪委发布《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要求中共官员主动交出不义之财，并宣布：“本规定发布后三十日内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对拒不纠正或者本规定发布后违反本规定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不消说，这个“三十天大限”以失败告终。按说这个文件的立意还是不错的。如果贪官们能主动交出赃款，就可以免于法律追究，另外，有了这笔贪官交出的钱，也可以用来兴办福利，算是给民众的某种补偿。但问题是，贪官们一眼就能看出，中纪委的这个文件只是要花枪，不是来真格的，所以不会理睬。除非中国开始民主化，比如说三十天后就要开放新闻媒体，或者是明年就要进行大选，贪官们发现这下是真的“狼来了”，那么他们才可能趁早地悄悄地交出赃款，以换取日后的免于追究。在现行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指望贪官们会自觉地主动交出赃款无疑于与虎谋皮。

重要的是，权贵私有化决不只是中下层官员的问题，它也是中共高层的问题。另外，权贵私有化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在中国，权贵私有化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强化了统治集团对民主的恐惧、敌视与抗拒。用那部影射陈希同案件的小说《天怒》里一位贪官的话，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巩固”。一是强化了民众的反抗。很多民众正是痛感于中共官员侵占他们的财产，故而要求实行自由与民主。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实行了自由民主，才能做到真正的还财于民与社会公正。

上面讲到的问题，我早先曾经多次讲过。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认为，要促成社会和解，就必须克服权贵私有化。这就要求我们不但要善于抓住这个问题，让更多的民众能投身到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中来，同时又要提出相应的具体措施，以便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中国和解智库的朋友和其他朋友都能对这个问题给与更多的关注。



嘉蔚（澳洲著名画家，自由撰稿人）



向齐家贞致敬

距今整整九十年前，也即“十月革命”的第二年，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留下他的临终遗嘱。这位红色先知预见到已和他分道扬镳的昔日学生列宁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景。他预言：“这场革命不仅要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八十年后他的遗嘱才面世。的确在这场布尔什维克主义狂飙中，已有无数革命的儿女被吞吃，而革命的父母们，托洛茨基以降，以及不止一打的共产党总书记都被他们自己制造的怪兽吞吃。

考虑到被吞吃的生命数量之巨，以千万计，那么齐家贞与她父亲齐尊周只是统计学意义上一个小数点。

但是历史对每一个个别的生命而言，却是另一种意义。齐家贞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半，都因此而葬送，她父亲生命中的黄金年代，因此而化为乌有。而如一段名言所说：“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暴政幸存者齐家贞有充分的理由仇恨悲剧制造人及其继承者。即使她因此而拿起武器复仇，我也理解并同情她，而且作为当年的一名共产主义者，我也无权批评她。

按照共产党闹革命的理论，受反动派迫害最深的那部分人最能成为奋勇战斗的革命者。那么倒过来说，齐家贞也许可以成为与专制制度斗争中那部分最激进的战士。

事实上任何一种政治运动中永远都有其激进与温和的两翼。其间差别不可以道里计。尤其如果运动的敌对方使用暴力镇压的手段，那么运动的激进翼一般会走上以暴抗暴的道路。

共产党并非生为恶魔。一个世纪以前它只是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左翼。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无论在当时，还是今日，都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支积极的力量。它体现对人类与生俱来的愿望之一，“平等”的追求。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创的这个运动，一路修正它自身的策略与目标，时至今日，已经成功地改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使当代资本主义空前的人性化。

但是列宁不愿意等待，走上用暴力强行改造世界的激进道路。他的目标是解放穷苦的劳动人民，很崇高，但一旦实行，一切适得其反。其后果，三代人以后的今天，我们都清楚了。所谓“理想主义杀人”，此乃典型案例。

一个月来，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的资本市场。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共产党人，他们真该举杯庆贺资本主义的末日来临。但是似乎无人庆贺。中国政府迅速与西方大国政府联手救市。这个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成功，共产主义运动在 1989 年已经划上句号。今日的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祖训，改名易纲，面向未来，如中国国民党一般脱胎换骨，成为顺应时势的现代政党。

虽然“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共早已成为走资党，但专制主义的统治手法却从毛时代继承至今。专制主义的统治制造了它的许多敌人。专制主义的敌人用什么手段去对抗专制主义永远是一个困扰无数

代人的问题。推翻旧专制主义统治的革命者往往转身就成为变本加厉的新专制者。

把今日的魏京生王军涛们与一百年前的列宁托洛茨基相提并论不会让他们感到荣幸，旁人听来也会觉得不伦不类。但有时问题的实质却惊人地相似。

目标的崇高未必保证手段也同样崇高。而手段的拙劣却注定要玷污目标的崇高。这是为什么列宁不赞成民意党兄长的暗杀恐怖主义，而普列汉诺夫又严词谴责列宁的阶级恐怖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向齐家贞致敬。因为她向她的敌人呼吁“和解”。

“和解”，Reconciliation 这个英文词，在我记忆里第一次听见，是南非曼德拉当上总统那一年。记得当我听到并弄清它的含义时，心头一热，然后便是感到折服。相同的感受此前只发生过一次，那是1980年代读到房龙的《宽容》。记得在电视里图图主教主持真相调查委员会，传唤一个又一个证人坐实是前曼德拉夫人温妮下令杀害了那个少年。温妮在图图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下，终于低头认罪，向死者的母亲致歉。

“和解”不是和稀泥，不是忘却，而是查明真相，载入史册，训诫后人，但处理从宽，促成政敌谅解与民族团结。

“和解”的吁请只有由受害方提出，才有道德上的感召力。曼德拉以27年服刑的资格吁请和解，才使和解成为全南非范围的事实。

齐家贞父女服刑年头虽少于曼德拉，但是在毛泽东的专政之下“刑满释放分子”与服刑犯的区别只在于监狱大小而已。加到一起，与曼德拉受难年头差不多。

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万个齐家贞也压不平一个曼德拉。而在道德的意义上，两人的分量相等。

但是在谈论南非的和解以及曼德拉的伟大时，世人往往忘却另一个人，那个与曼德拉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前南非总统德克勒克。

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德克勒克而非曼德拉结束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因为他代表掌握政权的那一方。如果德克勒克坚持不释放曼德拉而安稳做完他那任总统，那么南非黑人的解放可以再拖上几年甚至更长。所以也可以说，虽然曼德拉力排众（同志）议而调整立场，与博塔政府开始最初的互动在前，但和解的进程，则始于德克勒克在1989年10月的大声宣布：“暴力的季节已经过去，重建与和解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是谈判的时刻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分别受到各自阵营里激进派的攻击与压力。暴力镇压与暴力反抗的思维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并深具诱惑。在无数国家里，它扑灭了一次又一次和平的希望。只有在南非，在1990年代头几年里，由于这两个人联手高举“和解”的火炬，终于点燃了全民族的良知。

今天来谈论中国的“和解”也许还为时尚早。只有等到中国的德克勒克出现，齐家贞的“和解”才有了真正的对象。届时天安门上那尊超级大画像将会送到苏士比拍卖。不过在此之前，齐家贞的“和解”吁请仍有其重要意义。毕竟，“和解”与“和谐”仅一字之差。



笑蜀（中國，时事评论员）

从我做起，为我们整个民族找新路

—— 齐氏文化基金会首届“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奖贺辞



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仇恨的国家，旧恨新仇不断叠加，却又找不到缓冲和释放的出口，叠加的最后结果，就是形成一个巨大的堰塞湖，不知会在哪个风雨交加的暗夜溃决，呼啸而下，将无数无辜的生灵无差别地一概吞噬。

以真相厘清责任，以和解化解敌意，以理性平息戾气，因此是我们民族的当务之急。

这首先是强者的义务。仅仅指望用发展的红利，用欲壑的满足来换取公众的认可，这是靠不住的。不计代价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极限，而这个极限现在事实上是已经到来。遥远的地平线上，乌云正在聚集，雷声正在隐隐激荡。当此之时，若能幡然醒悟，在自己相对强大，暂且控制大局之际赶紧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用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对公义的敬畏，对原则的臣服，对过去的忏悔，那么也许不难在人心奠定基础，一切就都还来得及。但若见不及此，仍指望单靠经济支撑，无论形势如何变幻都不改“金鸡独立”的僵硬姿态，那么风暴一旦来临，后果自不堪设想。

风暴将至，但不能不承认，最应该做好准备的强者，并没有准备。甚至强者中的某些人，仍沉湎于“中国奇迹”的旧梦之中，“无与伦比”、“无比优越”的梦呓仍不绝于口。这才是我们社会最大的危机。这种背景下，作为从前的受害者，齐氏后人反倒挺身而出，从遥远的异国向自己的故乡，向父老乡亲呼唤和解，呼唤和解的智慧，祈求中华民族结束冤冤相报的血腥记录，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尽快走上理性、和平、清醒的民主转型之路，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何等的难能可贵。这声音应该为每一个炎黄子孙所倾听，所思考。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尽管我与齐氏家族素昧平生，但我愿意借此机会，用这封短柬，表达我对齐氏后人的敬重和响应，以及对于此次颁奖活动的祝贺。“中国和解智库”我同样所知不多，但他们倡导真相与和解，理性与和平的大方向，无疑跟我是有高度共识的。因此我认为，“中国和解智库”荣膺齐氏厚誉，亦属实至名归，我也愿意表示对他们的祝贺。

其实无论齐氏后人，还是“和解智库”，还是我本人，能力都是有限的，影响都是微弱的。但我们不以自己的微弱、不以自己的有限而自弃，只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事情，是对我们民族有益的事情，我们就应该不计收益地持续做下去。我们本来都是普通人，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过高估计自己。能做什么做什么，能做到哪一步做到哪一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我们做了，我们就对得起天地良心，就可以妥放自己的魂灵。至于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作用，这完全可以交给历史去回答，大不必念兹在兹。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有抱着这样的信念，才可能坚韧不拔，才可能负重前行，才可能水滴石穿。秉持这样的信念，齐尊周先生才会以古稀之年渡重洋，只身打拼，终于给自己的后人找到一条新路。作为晚辈，我们又岂敢懈怠，岂能不踔厉奋发，努力为我们的后人，为我们整个民族找到一条新路？



曾国一（中国自由撰稿人）



齊家貞女士，您好，向會議致賀，致敬。有一建議請考慮。因為瞭解不多，建議是否合適，請考慮。

暴力是暴力政权强加给亿万草民的。我赞同谢韬老人的“暴力社会主义”的论断。几十年都是在暴力社会主义的理念指导之下进行统治的。我从 1950 年起曾经是暴力政权中的一员。从“镇反运动”开始，我曾经是“大屠杀机器”中的一颗小小“螺丝钉”。这些“螺丝钉”们都被强力的灌输了“无产阶级专政”、“马上治天下”、“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概念。而且一直延续下来。。。。。

现实中的暴力，依然是暴力政权强加给亿万草民的。“权力寻租”、“品牌寻租”、“行政谋杀”、“权力强奸”、“潜规则”、“血酬律”。。。。。使得多少人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失地农民无法生存，集资诈骗网络诈骗无法追讨，上访被限制，信仰被抓捕。。。。。生存环境日益恶劣，不得已而抗争。

因此，我认为首先要阻止暴力政权暴力的滥用，草民以暴还暴是官逼民反的结果。罪责在于暴力政权。如果宣扬“不抵抗主义”。我认为是不应该的。此其一。

要暴力政权放弃“专政”的理念，不采用暴力统治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我认为不要“纸上谈兵”，无妨作点实事。如“三鹿”事件。受害者索赔，促其在不受暴力镇压之下，求得“和解”。失地农民在不受暴力镇压之下，收回土地，求得“和解”。。。。。诸如此类的，研讨一下如何为亿万草民挣回应该得到的生存权力。这才是亿万草民最关切的主题。

当然此乃非一日之功能够完成的。鼓吹民主意识。如谢韬老人所作的。米寿之年的谢韬。自费创办了《往事微痕》，免费赠送给国内外的读者。已经第九期了。谢韬说：“要揭露毛泽东的罪恶，把历史罪恶记录下来”国内这种刊物还没有第二个。还有一个《记忆》，目前只有网络版。而国外的由于层层封锁，草民很难看得到。这是途径之一。

目前国内“维权”越来越艰难。如何帮助国内草民维权，这是最应该考虑和讨论的重要议题。不以“暴还暴”，用什么途径达到为亿万草民伸冤、维权呢？不去关切如此重大的议题，还有什么意义？民政部中国彩票官方网站长期以来进行网络诈骗。受害者不知道有多少？一定有不少被骗得倾家荡产，走投无路的草民。但无法追讨。对于所遭受到的这种“行政谋杀”，没有任何抗拒、追讨的能力。这里有一个案列。是很有普遍意义的。。。。。这种“行政谋杀”在国内无法公开揭露，状告无门，追讨无法，而骗子们迄今还在继续作恶，坑害人民。。。。。

如果研讨能够接触实际问题，不只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程序，则草民会无限感激的。祝愿会议成功。

以上當否，請考慮，或可轉給理事、理事會和與會者。

安好。

曾國一



張小剛（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



各位朋友，跟前面的那些發言相比，我這個發言會比較短。前面聽了齊家貞齊大姐的致辭，我十分感動，我也為今天能見證這樣一個事件感到榮幸。

一個以中國大陸的家族遺產為基礎建立的民間團體，“齊氏文化基金會”，向另一個自發的中國民間團體，“中國和解智庫”，頒發“推動中國進步獎”，這個事件本身，就是推動中國進步，標識公民社會常態的一個典範，值得歷史記載。這樣的事件，在我們舉辦這個儀式的澳洲，也許是稀鬆平常的事，但對於我們這些在 1949 以後的中國大陸成長起來的人們來說，卻並不一般。我期盼不太遠的將來，像這樣的頒獎活動，也會在中國大陸進行。當然，這是要靠我們的努力，而不是任何人的賜予。

社會的進步，總是源於各種社會壓力的共同作用。每一股壓力，只要不去互相抵消，都能發揮它的作用，都必不可少。

中國和解智庫“以真相促和解，以和解推動轉型”的主張，是對強權者提出了要求，是給強權者提供的抉擇，無疑也是施加在強權者頭上的又一股壓力。

在今天海內外的中國人中，對呼籲和解，還有很大的爭議。前面周素子阿姨就質疑說，在當局還沒有為它犯下的罪惡道歉的時候，在當局還沒有放棄施暴的時候，你怎麼跟它談和解？其實，周阿姨的提問本身，就說明了這個事實：對和解的呼籲，必然是指向強權者的壓力。只要強權者還在以勢壓人，只要施害者還在施害，呼籲和解所形成的壓力，就必然施加在強權者頭上，就必然施加在施害者頭上。這就是我的看法。

在澳洲，我們經常會看到示威遊行，這些示威遊行不是在乞求，而是在施加壓力。在中國國內，現在每天也是有越來越多的示威、靜坐、請願等事件。這些都不是在乞求，而是在施加壓力。周阿姨（在新西蘭辦）的報紙，每天都有一篇斥責大陸當局的文章，這些文章也都是在施加一份壓力。呼籲和解，同樣也是在施加一股壓力。這個壓力哪怕看上去暫時多麼的微小，仍然有它的作用，仍然有它的必然性。即使表面蠻橫內心虛弱的權勢者面對這股壓力，暫時還只會做出不屑一顧的樣子，但是，當他們迷信強權暴力、習慣濫用警力對付民眾，結果卻激起像楊佳那樣的暴烈事件的時候，激起像瓮安民眾衝擊甚至火燒政府大樓那樣的群體事件的時候，當局中的一部份人，是會回想起，原來還有像和解這樣的另一種選擇。

齊家貞大姐在前面提到齊氏基金會的宗旨時說，“中國很大，我們很小，但是我們心齊”。雖然我們給出的每一個壓力可能都很小，但是正因為中國很大，各種壓力很多。我們每一份力量與其它各種社會動力結合在一起，只要能夠方向一致，它們的合力，就會十分巨大，就必能撬碎阻礙進步的頑石。

在此，我對中國和解智庫的獲獎表示祝賀，對齊氏文化基金會的頒獎表示感謝。你們今天各自的努力，都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中，重要的組成部份。